

# 從利瑪竇墓地

## 發出的交談呼籲

梁作祿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決定參加瑪薩拉達及羅瑪額我略大學聯合主辦有關利瑪竇的國際研討會，使籌辦人士十分驚訝。十月廿五日黃昏，他在額我略大學演講廳宣讀的演詞，特別讚賞利瑪竇在東西方擔當的中介角色，亦以官方權威宣佈羅瑪對當代中國的現況採取開明態度。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這位在四百年前致力於中國科技進步的外籍神父表示尊崇，教宗爲此而主動致以衷心的感激。

近期《中國日報》（一九八二年三月三日）的一篇文章指出，當局對曾遭紅衛兵破壞的利瑪竇墓地，已於一九七九年三月決定重修。自從推翻「四人幫」的極左路綫以來，中國在艱苦長途上邁進。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人民日報》刊登一篇長文，讚譽利氏爲「溝通中西文化的先驅者」。過去兩年間，中國各大學歷史學者所提供的寶貴研究，指出利氏具有深厚的品格特質，以開放的態度與中國友人分享他從歐洲帶進來的科學知識，抱着誠實和讚賞的態度把中國文化和社會優長介紹給西方。

正如艾切卡雷樞機訪問北京時，有人說得對：「倘若利瑪竇今日還在生，他一定會盡力推動中國的現代化計劃。」（新華社，一九八〇年三月三日）《中國日報》最近有一篇文章承認，在文革時代，利瑪竇及其同伴曾被誣控把「帝國主義文化」輸入中國。該文章又說，我們應倒轉過來，承認他們把西方的科學知識帶入中國。」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除了承認這種科學貢獻外，還強調利氏在中國工作的雙重任務，使他成了一位真正溝通文化的中間人。教宗說，利氏「由於能夠深入鑽研中國文化和社會，把歐洲的科技帶入這個偉大的國家，亦使西方對中國人民的文明進步和文化光華大開眼界。」藉着工作的耐力和尊重的態度，利氏成了「中國和歐洲兩大文明間的橋樑」。

在分析了利氏在不同層面上對本地化工作的努力後，教宗指出，利氏的科學貢獻所以受到中國人士特殊的尊崇，是因爲「他的謙虛、誠懇、無私的態度，不是出於別有用心，也沒有跟任何外國經濟或軍事力量搭上關係。」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讚賞利氏的取向，「藉着追隨那些關心社會生活的學者的生活方式，在社會的中心見證自己的宗教信仰。這樣，利氏有意顯出自己的宗教信仰，不但不逃避社會，反而進入世界，改進社會生活。」

回顧天主教與不同文化背景各民族相接觸的悠長歷史，教宗毫不懷疑把利氏的努力與羅馬的哲學家及殉道者聖猶斯定、亞歷山大城的格來孟及奧力振相比，這些二、三世紀的先哲都很關心如何採用當日文化社會可以明白的辭語，把基督信仰的訊息翻譯出來。

教宗演說的語氣及內容，顯然是一種對中國表示善意和欽佩的舉止，與一九八一年二月在馬尼拉所發表的演說採取同一論調。在馬尼拉，教宗主要是向中國天主教團體說話；但在額我略大學，教宗則因為思考到利氏的經驗，而集中於溝通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更闊問題上。

論及「國內外所有中國人民基本上擁有統一的人性及文化價值」，教宗加上一句有政治意味的說話，他說：「教會在欣賞每個民族的精神特質時，不能不同時注意到，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國人民是一個統一的大整體，亦是一個有豐富傳統及生命活力的綜合體。」大致上，教宗意欲顯示出自己不贊同「兩個中國」的政策，並準備好如何處理這種立場所帶來的必然後果。

教宗並未忽略「誤解與困難在過去出現，至今仍然存在。」但他深信利瑪竇建築在教會和中國文化的「橋樑仍然顯得安全穩固」，因而使他重新具有信心。

提到展開有效交談方面的障礙時，教宗說：「我們有信心能夠清除所有障礙，找出適當的方法及妥善架構來重新展開交談，並使交談時常保持。這樣，所有中國信徒都能安然生活在自己的國家團體及教會中，亦必然使教會所深深欽仰愛慕的中國蒙受利益。」

指向利瑪竇的墓地，教宗說：「它對羅馬和北京發出有力的呼籲，邀請它們重新恢復利瑪竇四百年前已經努力開始並獲得成就的交談。」

世界各地對中國擁有同樣愛心的基督徒，亦與教宗聯結一起，衷心期望和禱告這一天早日來臨。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寫於羅馬